

關於中國1949年以後歷史的看法

◎ 王申酉

編者按：王申酉1976年9月9日被捕，1977年4月27日被槍殺。這是他在獄中所寫的「供詞」，原是給他女朋友的信的回憶。

供詞



王申酉

1976年11月18日

關於中國一九四九年以後歷史的看法

當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獲得全國政權時，它所面臨的國家是一個經歷了長期外戰與內戰、政治上分崩離折、經濟上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國民黨的腐敗政權在戰爭中把國家搞到了歷史上少有的毀滅破敗的邊緣。從經濟形態分析，國民黨四大家族代表了官僚買辦的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嚴重地阻礙了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建國初期，全國國民經濟總產值中，工業只佔了不到10%，其餘90%以上是由汪洋大海似的小農經濟或封建宗法經濟所產生的。在北方老解放區，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土地改革，使農民從封建宗法經濟的束縛中解放成為一群小私有者，但在南方廣大新解放區，土地改革還沒有實行。因而無論城市，還是農村都還十分需要徹底實行資本主義性質的變革，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掃清道路。建國後三年（1950–1952年）的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正是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時期。當時的情況，誠如劉少奇說的，中國資本主義還處在年輕的時期。所有實行的資本主義性質的變革措施都獲得成功，並確實大大恢復了國民經濟。鎮反和肅反運動對於肅清國民黨殘餘破壞力量，鞏固新社會的政治基礎是十分必要和正確的，高、饒的黨內分裂活動也沒影響歷史大局。

1953年開始的互助組和1955年開始的合作化運動引起了黨內的爭論。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教導，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是需要成熟的物質條件的，那就是生產資料的高度集中，生

產、流通和交換、分配的高度社會化，大工業佔領一切物質生產部門。但是馬克思主義也教導我們，這並不是說對於一個具體的國家，非要等到最後一個小生產者被剝奪掉生產資料後才能實行社會主義變革。無產階級可以在成熟的歷史條件下，先奪取政權，借助上層建築的力量，把小生產者組織起來，採取協作制進行生產經營，給以物質和道義上的幫助，使它向大生產的方向發展，通過大生產表現出來的五大優越性對其他小生產者起示範的作用，從而使廣大小生產者（如農民、手工業者等等）避免經歷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被剝奪生產資料、蒙受巨大災禍的歷史過程而直接向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過渡。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法德農民問題》及其他一些著作中闡述了這個思想，列寧（Vladimir Ilich Lenin）也在《論合作制》等著作中作了論述。

劉少奇在1954年一個批示中曾提出當時實行合作化是一種不切實際的農業社會主義的空想。我很難知道，合作化對當時的歷史條件來說是否成熟，但搞合作化的大方向是對的。總之，黨內就合作化問題是發生了爭論，但意見很快就統一了。在毛主席親自領導下，中國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業合作化運動。這是無產階級在掌握了大工業、掌握了政權的條件下借助於上層建築的力量發動的一場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是完全符合歷史發展潮流的經濟變革。毛主席親自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文章寫了許多批語，具體領導了這場有深遠歷史意義的運動，並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不久，民族資產階級既然隨著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而被割斷了城鄉的資本主義聯繫、原料來源與銷售市場被控制，在1956年實行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國城鄉的社會主義革命獲得了偉大的勝利。就在1956年中，召開了八大，全國一片歡騰，滿懷著對國家前途的希望，中國共產黨達到了建黨以來最團結、最統一、最生氣勃勃的頂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也達到了戰後的最高點，以米高揚為首的蘇共代表團以及其他80多個國家的黨政代表團出席了中共八大。總之，當時國際、國內的團結景象使以後經歷了近20年的不斷分裂痛苦的中國人來說成為無比美妙和珍貴的回憶了。

同時，建國後到這段時期國民經濟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和蘇聯實際經驗的指導和物質手段幫助下的高速度的健康發展，也使以後經歷了十多年國民經濟的破環或停滯不前的中國人民留下了無限悵惘的情感。我正好在這個歷史的關鍵時期開始懂事，對當時祖國在政治、經濟上的變化多少有一點大致的感性認識。

1957年的反右鬥爭，基本上摧毀了資產階級民主黨派的力量，黨外資產階級從此基本上退出了中國的歷史舞台。黨內和黨外的關係也從此發生了變化。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運動為黨內分裂埋下了深深的種子，甚至為八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黨內大分裂，埋下了禍根。因此，1958年是考察建國後我國歷史的極關鍵的一年。

1958年初的中國經濟形態是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的。在農村，經過了三、四年的發展過程，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合作社（初級社和高級社）正在鞏固之中，在生產上實行集體協作勞動，在分配上從按土地分紅過渡到按勞力分紅。實在說，由於絕大多數農民還採用原始的、簡單的勞動工具進行手工勞動，而且工業還遠不能大規模地提供農業機器給農村。而農民階級本身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生活慣了，無論在生產經營上、意識形態上還沒有完全適應新的經濟關係。因此，可以想象，合作社經濟還要經歷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才能真正固鞏起來。列寧說過，只有大工業才是社會主義的唯一鞏固基礎。在原始的鐮刀鐵錘上是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在當時，應高度發展城市大工業，提供足夠的農業機器，對農村實行必要的技術改造，使農村的生產力性質真正適應合作社經濟的生產關係的性質。但是毛主席當時卻不顧中國的現實歷史條件，發出了「人民

公社好」的號召，也就是說，將大致相當於村或幾個村的高級社擴展到相當於鄉或幾個鄉規模的公社，提出政社合一的一元化領導辦法。從經濟形態上說，是把核算範圍改為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不久又提出把核算單位上升到公社一級，否則無法顯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優越性。事實上，後來經濟成本核算連公社一級也取消了，大搞一平二調、共產風，各種輿論宣傳機器都在宣傳共產主義就在眼前了。農村實行了生產不計報酬，吃飯不要錢，家庭經濟也取消，貨幣經濟也瀕臨取消。我當時正在初中唸書，政治老師們向我們講解《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的語錄，與我們一起暢想共產主義即將到來的景象。

在工業方面，毛又提出，一個鋼鐵，一個糧食，有了這二個就甚麼都好辦了。結果各行各業都大煉鋼鐵，甚至從農業中抽調大量有生力量煉鋼，嚴重打亂了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均衡比例。鋼鐵是從1957年的535萬噸發展到1958年的1,070萬噸，到1959年又翻了一番，達到令人可疑的1,800萬噸，但其他部門的損失則是極為嚴重的。總路線、大躍進的口號是提出來了，十五年趕上英國的口號也提出來了。但是，結果是甚麼呢？

人們陷入盲目的狂熱之中，人為的經濟災難到了1959年就開始顯露其禍害了，只是還沒有被大多數人看出罷了。即使有清醒的人，也多半不敢發表意見。獨有那個熱血老人彭德懷不僅頭腦十分清醒，而且人格正直，有大無畏的勇氣，不顧高齡，奔波到全國許多地方進行了大量調查研究、實地視察，把災難性的經濟形勢與造成的根源作了分析，寫成了長篇的萬言報告給毛主席，結果在廬山會議上釀成了一場巨大的政治風波，成了黨內分裂的導火線。彭德懷並沒有搞陰謀，而是通過正常途徑寫信給中央，也沒有在信中追究個人責任，還是比較客觀地分析了中國當時困難的經濟形勢，要求採取措施改變過來。彭德懷在寫信前曾說過，拚著這身軍裝脫掉也要幹一下，可見他是置個人政治生命於度外站出來的。毛主席看了後果然勃然大怒，用列寧罵普列漢諾夫的話大罵彭德懷。劉少奇、周總理、鄧小平是同情彭德懷的，但沒有辦法，結果毛撤了彭德懷國防部長的職務，改派林彪任國防部長。

彭德懷的勸告絲毫沒有打動毛的心靈，反而更使他下決心按原來路線做下去。毛搞了個關於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決議通令全黨，在全黨掀起了一場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在中央到各地揪右機會主義分子，結果再沒人敢說話了。全國刮起了浮誇風，甚麼稻米畝產上萬斤，甚至幾萬斤也上了報。可惜我當時還不太懂事，因此不能詳述當時大批大批的荒唐的經濟笑話。總之，這場經濟災難像一匹野馬一樣在毀滅性的路上狂奔，到1962年眼看要摔到萬丈深淵中去時，才算被繩勒住了。

三年後，彭德懷又寫了被稱為翻案書的信給中央。三年的國民經濟困難使1957至1962年第二個五年計劃許多指標沒有完成，從1960年起甚至再也無法向國內外公佈國民經濟完成的具體數字了。工農業生產遭到很大破壞，通貨膨脹十分嚴重。究竟這三年造成的經濟破壞達到甚麼地步，讓歷史學家們去寫吧。這裡要提的是1962年的中央、省委、地委、縣委的七千人幹部大會，這是黨的歷史上空前規模的幹部大會。矛盾已充分暴露了，再也無法掩蓋了，全黨聚在一起評價這三年災難的狀況，討論解脫的辦法。毛在會上處於孤立的地位的，只有林彪為他說話。

劉少奇在大會上談到當時中國的經濟形勢是「處於經濟崩潰的邊緣」，提出這三年經濟困難的根源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從中央到省地幹部在他的啟發下都談出了真實的各地情況與個人的意見。

黨中央面臨這樣的局面，採取了許多從歷史上看是正確的政策和措施。首先是決定廢棄三面紅旗的口號，提出了「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方針，並規定1963—1965年為國民經濟調整時期，採取「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從1966年起再搞第三個五年計劃。毛也同意將農村的經濟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一級，實際上回復到人民公社化前的情況，只是為了顧全他的威信，不取消「公社」的名稱。但以後的歷史學家要作公正的評論的話，總只能這樣認為，三面紅旗是失敗了，是一場歷史的悲劇。毛這時讀了點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書，讀了蘇聯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也多少認識了一些問題。不過他指責各地幹部們不懂價值規律，要求大家學點政治經濟學，還特別介紹了那本價值不大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給大家，並作了一些評注。我想，如果他在1958年注意到這些問題，就不至於提出搞人民公社化運動吧。

另外，為了團結黨內外群眾一起同心同德、齊心協力地度過難關，黨中央還在黨內恢復了一大批被冤枉地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名譽。鄧小平公開說過，反右傾百分之八、九十搞錯了。在黨外，也摘了一大批1957年帶上的右派帽子。在一些傳達到全黨的文件中對三年國民經濟困難作了比較客觀的估計。甚至在拿定息的資本家中，也允許他們借神仙會之類的形式談看法，揭陰暗面。黨內外民主有了不少氣氛，人們被允許說話了。如果黨好好幹，帶領人民好好幹，中國還是有前途的。

黨中央工作從此以後主要由劉少奇、鄧小平主持，國務院是由周總理主持，毛主席則不大管具體中央工作了，在全國視察、遊歷，並讓林彪抓好軍權。他在1962年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口號，顯然他是仍不願承擔三年經濟困難的絲毫責任的。但他表面上不能不承認自己犯了錯誤，並要各地幹部到各地向人們傳達他的這個意思。劉少奇真在湖南這樣做了，結果犯了一項大罪。

這裡就使人想起列寧了。列寧在蘇聯建國初期搞了很短時期的空想共產主義措施，造成了經濟的混亂、受損局面，他很快能洞察出來，不僅提出了新經濟政策來挽回局勢，而且在好多中央的、黨內或黨外的會議上向群眾公開承擔自己的責任和錯誤。這不但沒有損害列寧的威信，反而提高了他的威望。公正的歷史學家會客觀地分析當時的歷史條件。當時內戰十分激烈，搞戰時共產主義的措施是有客觀的歷史要求的。當時工業受到十分嚴重破壞，極少可能有足夠的產品去與農民交換糧食，為了維持戰爭和工業生產建設，多少要強制地採取徵集制獲得糧食，因此歷史會諒解列寧的作法。

而毛主席在1958年的做法，是無法解脫歷史的評判的。當時中國一片和平建設的景象，又剛經過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高速度經濟發展，並沒有為他的做法提供客觀的辯護因素。而且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現成的，蘇聯建國初期短期的空想社會主義實踐造成的歷史教訓也是現成的。還有，在提出人民公社化運動時，特別在1959年蘇聯是明確提出不同意見勸告的。黨內以彭德懷為代表也提出了不同意見。所有這些都評價在1958年的做法提供了客觀的基礎。從1963年開始，黨中央又提出在全國展開一場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使人想起蘇聯的情況。列寧在新經濟政策中向資本主義勢力作讓步，是為了準備條件進攻資本主義。我黨中央在三年國民經濟困難時期為了從困境中解脫開來，也不能不採取了許多向資本主義讓步的方針政策，如「三自一包」等，這歸根究底有利於資本主義勢力的發展。在當時的具體歷史條件下很難避免這樣做。而一旦經濟恢復過來，搞社教運動向資本主義勢力進行反攻也同樣正確。只是劉少奇的目的是進一步整頓由於三年經濟破壞而造成的各地政治、經濟癱瘓狀態，消滅城鄉自發資本主義的勢力。

而毛主席的目的是把矛頭直指「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由於周恩來總理在行政方面基本上是執行了劉鄧路線的，因而根據條件的成熟程度，他們早晚也要打倒總理的，只是經過幾次回合沒有成功，後在去年下半年提出評《水滸》時才公開打出信號。林彪在主持了軍委工作後，最大的任務就是搞個人崇拜、個人迷信，以為未來的黨內鬥爭作準備。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搞了三年左右，並沒有達到目的。於是就尋求另一種形式，這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由於你我都親身經歷了這場運動，對於運動的發展過程就不必多談了，我所要著重談的是從理論上粗淺地勾畫一下這場運動的歷史背景、經濟根源。既然，黨內大分裂的最近淵源出在1959年廬山會議的彭德懷身上，文化革命的導火線就由江青出馬在上海通過張春橋物色到姚文元在《文匯報》刊登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點起來。此文由毛澤東指明，好處在點了吳晗的名，但未打中要害，要害在「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毛在廬山會議罷了彭德懷的官。但此文並未引起人們注意。彭真搞了1966年的二月提綱，只把這件事納入學術範圍討論。北大文科起勁地翻閱上千萬字的海瑞資料，沒有想把事情鬧到政治問題上去。碰巧北大哲學系總支書記聶無梓在1964年秋開始的北大社教運動中與北大黨委書記陸平有矛盾。聶元梓等七人在康生夫人曹軼歐的直接指示下在5月25日貼出了《陸平、宋碩、彭蓓雲在文化革命中幹了些甚麼？》的大字報，把火燒到北京市委身上（宋是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康生在6月1日向全世界廣播了這張大字報，於是文化革命拉開了序幕。我起初對這場鬥爭性質認識極模糊，以為不過是個人之間爭權奪利。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並用它來思考事情的本質後才認識到我的想法是錯誤的。這場鬥爭的性質歸根究底是兩種性質不同的世界觀和路線的鬥爭，是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爭論的問題的焦點仍在於那個老問題：甚麼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通過何種途徑達到社會主義社會。由於對這個問題的不同看法而形成了空想和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區別。

毛澤東在1965年5月7日在寫給他「最親密的戰友林彪」的信中十分具體、形象地描繪了他關於改造社會的藍圖，這封信最好不過地集中反映了他的世界觀。在他的理想世界中，社會應分割為一個一個彼此獨立的經濟共同體—公社。在這個公社中，工人、農民、戰士、學生不應有嚴密的分工，都既要學工、又要學農、學軍，還要從事上層建築領域的活動——即批判資產階級。這個公社的生產方式是集體性質的，交換主要發生在內部，因為現實中的農村人民公社正是如此。因而這樣的公社顯然是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佔統治地位的。當然它也與外界發生物質交換，但只是與國家交換，彼此之間是不發生交換的。不過根據現時的實際情況，這種與外界的商品交換只佔很弱的比例，公社內部的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多半是採取實物形式分配的。毛澤東在信中又隻字不提這種集體生產方式需要用大機器進行物質技術改造，自然根據每個人要從事不同行業的勞動這一點來看，公社社員是不會被要求從事大規模的分工的協作的。既然生產方式是這樣的，那麼人與人的關係必然由這種生產與交換及分配方式決定是封建家長制性質的。在上層建築領域的活動，唯一就是批判資產階級，而資產階級的階級本性來源於商品交換、貨幣經濟。結果這樣的公社自然會盡一切力量防止商品交換、貨幣經濟的侵蝕作用，而每個公社社員又由法律規定是無法脫離公社的，世世代代要生活在祖傳土地上，從事各種勞動，並且永遠保持固有的生產方式沒有任何改變的希望。這樣的村社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很長一段時間，如西方的克蘭制、馬爾克公社，東方的印度和斯拉夫公社。不過，誠如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這種公社只是東方專制主義制度的社會基礎，只會造成農民永久性的野蠻、落後狀態，絲毫沒有社會主義的因素。

是的，在共產主義社會裡，是要消滅分工，消滅三大差別，但那是要有物質基礎的。恩格斯曾指出，有一點是清楚的：當人的勞動生產率還非常低，除了必要的生活資料外只能提供微小的剩餘的時候，生產力的提高、交換的擴大、國家和法律的發展、藝術和科學的創立，都只有通過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這種分工的基礎是，從事單純體力勞動的群眾同管理勞動、經營商業和掌管國家大事以及後來從事藝術和科學的少數人之間的大分工。

恩格斯進一步補充說：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的到現在為止的一切歷史對立，都可以從人的這種相對不發展生產率中得到說明。當實際勞動的人口要為自己的必要勞動花費很多時間，以致沒有多餘時間來從事社會的公共事務，例如勞動管理……等等。只有通過大工業所達到的生產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勞動無例外地分配於一切社會成員，從而把每個人的勞動時間大大縮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夠的時間來參加社會的理論和實際的公共事務。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四篇《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中，極其天才地指出，人類的分工在人類歷史上曾經起過的巨大歷史作用。他指出人類的集體勞動並不一定會使生產方式發生質的變革，只有借助生產工具的變革，由協作、分工、手工業、工場手工業到利用機器的大工業，才會使生產方式由量變發展為質變。在這時，集體力量的總和遠遠超過個別人單獨勞動時的力量的總和。歷史的辯證法在這裡也發生了偉大的作用：為著達到消滅人類的分工，剛好需要先實行最大規模的分工。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序列中，各種經濟形態的交替剛好標誌著人類分工的進一步發展，這種過程要直到共產主義才向相反方向變化。

這裡問題的實質不在於分工是否要取消的問題，而在於取消分工的歷史條件問題。我想談談在中國現時歷史條件下，是應該取消分工的時候了嗎？

恩格斯在上面的教導中提到「必要的生活資料」和「自己的必要勞動」的說法，既然「民以食為天」，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一般也以農業消費品看作為必要的生活資料。有一個常識：中國的人口有80%是農民，也就是說中國人需要四個人養活五個人，或者說一個農業人口只能提供滿足四分之一個人的剩餘產品。而再看看世界上其他國家吧，蘇聯的農業人口約佔百分之三十多，也就是說可以提供滿足二個人的剩餘產品。日本的農業人口約佔百分之十幾，日本的糧食自給率約80%多，故一個農業人口可提供滿足五至六個人需要的剩餘產品。

美國的農業人口約佔百分之五，可以養活全國，同時又是世界糧食市場的最大賣主，故一個農業人口可提供滿足二十多個人的剩餘產品。以上的數字並不精確，但不會有大的出入，至少對我所述及的問題足夠了。

人類的最基本的活動是物質生產活動，而物質生產活動中最基本的是農業勞動，這是其他一切物質生產活動的基礎。人類只有首先最大地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把大批人力、物力從土地上解脫出來，才能大規模從事其他部門的勞動，再能進一步從事非物質生產活動，如國家管理、科學與藝術等等活動。像美國那樣的經濟活動中，已經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口從農業生產活動中解放出來，可以從事其他活動（其中約有一半以上是而非物質生產活動）了，但我們從來沒有看到過有過絲毫跡象，在美國經濟生活中，已經到了可以停止分工的地步了；恰恰相反，分工在進一步發展。更不要說世界上其他任何

國家了。任何一個正視現實的人都可以看到，隨著更複雜更大型的生產工具、設備的出現，隨著更大規模生產組織的形成（托拉斯、康采恩、辛迪加……），人類的物質生產勞動要求人類更日益地發展著分工。甚至在非物質生產活動中，在腦力勞動中，人類的分工也在飛快地發展。在二、三百年前，一位學識淵博的學者可以同時成為哲學、文學、自然科學的權威。但是現在，在無線電科學這樣一個狹窄的自然科學領域裡，一個人也遠不能窮盡全部知識，僅僅例如其中天線這樣一個專門題目也足夠一個人耗費他畢生的精力了，甚至個別人還無法在這個專題上趕上全世界一日千里的迅速發展。

毛澤東在工業方面的創造，是1958年提出的《鞍鋼憲法》，即二參一改三結合，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幹部、技術人員三結合。在這裡，應用馬克思主義原理來分析是不太困難的。這裡不談了，只是順便提一下。要談論生產，就要抓住生產、交換和分配問題，而鞍鋼憲法都沒有提及，只提倡取消分工。

當我們考察歷史人物的作用時，當然不是根據他自己談的看法為標準，而是根據他的實際行為，不能根據他的個別言論判斷，而是根據一貫的言論、著作和實際作為。在林彪的指示下，葉群、吳法憲在江省太倉縣洪涇大隊蹲點搞了一個典型。（正是毛澤東關於改造社會藍圖的實際例子），在1967年中起作為樣板向全國推薦，其中特別宣傳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年婦女顧阿桃作為社會主義新人的典型。

如果學習馬克思主義只限於書面的概念，不接觸現實社會，那麼只會變成學究書呆子，甚至走向馬克思主義的反面。當時，我還不認識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正確性，根本就不懂。但預感到葉群搞的那個樣板將是今後中國社會形態的縮影。為了能先接觸、適應一下這種社會制度，就主動報名與班上的黨員和積極分子一起去洪涇生活了半個月，實地體驗生活。現在，再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去回顧這些日子的見聞，是很有啟發的。那裡的社員們一天到晚在搞鬥私批修，無論同訪客們作的大規模講演還是生產隊會議，甚至在家庭會議上，都在搞鬥私批修。所講內容無非是頭腦裡產生了私心，如何通過學習，即林彪所說的「靈魂深處爆發了革命」後「立竿見影」，戰勝了私字，建立了公心。林彪是一貫鼓吹精神因素第一的政治騙子。在他看來，「一擔糞，是挑在大田裡，還是自留田裡」，這意味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原則區別。在他看來，只要在人的頭腦裡強制灌輸某種道德教條，就能產生社會主義的意識，從而能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了。

在我讀過的任何馬列經典原著中，我從來沒有發現過只要進行單純的道德說教——事實上往往是禁欲主義的基督教的變種——就能改變生產關係本質的說法的絲毫痕跡。相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反復批判過那種「舊的、還沒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義歷史觀，不知道任何基於物質利益的階級鬥爭，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質利益。」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歸根究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係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係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觀念。如果說林彪指的「私」字就是指的物質利益，那麼他那套粗陋的原始共產主義謬論只能從原始的基督教義中尋找根源。顧阿桃是個文盲，連字也寫不來，據說原先是個充滿私字的普通社員。後來在葉群等培養下，用圖畫來表達自己鬥私批修的情況。可見，林彪的教義只能從最落後的社會階層中找到微弱的基礎。而後來林彪一倒台，顧阿桃也成了笑柄。

按林彪對於經濟關係變革的觀念，他在上層建築也採取了相應的辦法。1968年1月從上海開始，一個接一個地在各省市自治區建立了軍事專政，基本上類似於秦始皇的郡縣制度，以適應經濟基礎。與此相對立的是另一條路線，這就是或多或少從劉少奇、周總

理、鄧小平的言論、行動中表達出來的路線。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考察了社會主義社會物質條件的形成條件。在馬克思時代，認為像英、德、法那樣資本主義生產分工最高度發展的文明國家裡，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最充分。後來到了列寧時代，在帝國主義條件下，社會主義革命只能在資本主義環節最弱的地方即俄國發生並能成功。歷史事實已經證明，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並不意味著社會主義物質條件已經成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規律已發揮盡歷史作用。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物質條件比俄國更不成熟的條件下，可以想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規律更不可能完全發揮盡歷史作用，它一定會以各種形態起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作用。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只能承認這種作用，周密地分析、考察、掌握它的規律，引導它在一定的範圍內發生有益的作用，使之為創造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服務。

現在，無論甚麼人，至少在口頭上都承認像價值規律這樣一條支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基本的規律仍在社會主義社會內起作用。價值規律起源於商品經濟，只要社會生產以商品經濟形式進行，價值規律就一定起作用。它規定：商品價值由生產這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決定，商品交換以等價進行。這樣社會生產要得以進行或擴大，就必然要進行價值的經濟核算，生產的成功與否要以利潤為標誌。在分配方面，必然要採取按勞取酬、物質刺激、獎金制度，如果分配採取平均主義，那麼意味著勞動效率低的人剝削效率高的。在資本主義國家裡，價值規律是充分起作用的，這樣，使生產在無政府狀態下進行，各個資本家在生產中獲得的利潤率通過價值規律的盲目作用趨向於平均化。在社會主義國家裡，則限制價值規律的作用，利潤的高低不全是由經濟運動自發造成的，而是通過國家對收購、消費價格的有計劃調整來趨向於平均化的，在分配上也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作用，減低收入的差別，但不消滅這種差別。決不應像現時我國實行的那樣（如青年工人或農場場員的收入幾乎一律相等）。因而在社會主義生產中，利潤仍應看作衡量企業經營成就的主要標誌，物質刺激、獎金制度仍應看作推動生產力發展的主要手段。

另外，生產資料的不斷集中，生產方式的不斷社會化，商品市場在全國甚至全世界範圍的擴大、分工的不斷擴大、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一切生產部門包括農業生產都採用大機器大生產、農業人口不斷地相對減少、非物質生產勞動人口不斷地相對增加、勞動生產率的不斷增長……這一切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經歷的過程，都必然應該在一個社會主義物質條件不夠成熟的社會主義國家裡同樣發生，而且要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更快地發展。在中國怎麼樣呢？正視現實的人都能作出令人悲觀的結論。

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在三年國民經濟困難時期過去後，迫不及待地制定了一系列方針、制度，如《工業七十條》、《高教六十條》、科技工作十幾條。召開全國托拉斯會議準備大搞托拉斯企業等等措施，都無非為了一個目的：讓價值規律起最大的歷史有益作用，促進社會生產力的迅速提高。無疑，所有這些，歷史都會作出肯定的結論。

列寧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除了採取過前面談到過的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措施外，還曾提出過其他一些更為教條主義者驚訝的主張。例如，西方資本主義企業發明了泰羅（F. W. Taylor）制，通過對工人在機器操作過程中的動作分析，建立更加嚴密的生產規章制度，以便提高勞動生產率。列寧一方面指出這種制度加劇了資本剝削的強度，但又提出要在蘇聯企業中學習其科學的因素，為提高社會主義生產率服務。另外，列寧甚至提出向帝國主義租讓一些企業和礦山，借助帝國主義資本來開發國內的礦山、

建立企業等。至於對資產階級學者、專家搞高薪制問題，列寧把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提到了黨綱討論會議上，強調了黨對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方針政策的重要性。到了斯大林（Joseph Stalin）時代，上述措施進一步發展，並提出了其他不少擴大價值規律作用的措施。結果，一切歷史學家無法否認的是：在斯大林二十多年的執政下，蘇聯的國民經濟總值從世界第七名上升到第二位，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更鞏固強大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某些固有規律從來沒有停止、也將繼續在蘇聯發揮巨大的歷史作用。

馬克思主義認為，為了解決社會科學問題，產了真正獲得正確處理這個問題的本領，而不被一大堆細節或各種爭執意見所迷惑，為了用科學眼光觀察這個問題，最可靠、最必須、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歷史聯繫，考察每個問題都要看某種現象在歷史上怎樣產生，在發展中經過了哪些主要階段，並根據它的這種發展去考察這一事物現在是怎樣的。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某些規律在社會主義社會裡的作用這樣一個問題，正是需要這樣考察的問題。我從一開始粗淺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原理，簡略介紹了人類社會各個經濟形態的發展過程，又介紹了中國歷代經濟形態的演變歷史過程及其在上層建築領域中相應變革的歷史過程，又談了社會主義學說的發展和對立派別鬥爭的歷史。所有這些歷史性的敘述雖然十分粗糙、皮毛，但都為了通過歷史過程的敘述來為考察現實服務。

從上面的簡略敘述中，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中兩條路線的鬥爭是有深刻的社會根源的。兩種性質對立的世界觀、路線在黨內歷史發展中，在民主革命階段沒有甚麼大分歧，在1956年八大以前有小分歧，從1958年公社化運動後發生了不可調和的分歧，而到了文化革命時期就成為你死我活的分歧了。分歧的焦點也許仍可列為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社會究竟是甚麼樣子的？應通過何種途徑達到社會主義？